

談近代中國的民主

—訪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師陸人龍博士—

• 梁潔芬 •

問：在傳統的儒家政治思想中，是否蘊含着民主政治的成份？

陸：中國傳統的儒家政治思想，過去朝着兩個方向發展：一方面強調君權的重要性，以「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道德觀念，要求由下而上單方面的道德責任。雖然亦要求為君為父為夫者的道德責任，且這道德責任也發揮了一定的約束力，但往往在實行上只是一個理想而已。但另一方面，傳統儒家也強調民為貴的「民本」觀念，明末清初的名儒黃宗羲已將「民本」的觀念發揮闡述得很透徹；其後，梁啟超也有進一步的發揮，謂中國的政治理論內已有「民本」的色彩。因此，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蘊藏着民主的成份。若以西方的民主觀念去衡量，中國的政治思想含有「民享」(FOR THE PEOPLE)、
「民有」(OF THE PEOPLE)的觀念，而缺乏「民治」或「人民參與」(BY THE PEOPLE)以及「人權」的觀念。人民在政治上只有義務和責任，而權利方面却落在統治者那邊。

問：民主思想如何在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中萌芽和發展？

陸：十九世紀清代嘉慶道光年間，中國的政治開始潰敗，當時已有一些知識份子，

例如龔自珍、魏源等，以婉轉的言詞，要求政權作某種程度的開放，他們利用「得民者昌」的傳統觀念，強調人民的重要性，希望國家廣開刑路，使民生疾苦能上達，這樣看來，傳統的中國政治思想，雖未達到民主參與的地步，但已有「民主」的部份內涵。儒家「忠君」及「三綱」的思想一方面局限了中國民主思想的發揮，但另一方面「得民者昌」及「重民」、「得民」等思想，為日後舶來的西方式民主思想鋪了路。

十九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間，中國部份知識份子很留意西方民主政治，他們將西方的政治架構粗略分為三大類：民為主之國——以美國為代表；君為主之國——以俄羅斯及德國為代表；君民共主之國——以英國為代表。他們並未消化和吸收西方的民主政治觀念，但以中國儒家的觀念去衡量西方民主制度，以為英國所行的議院制度，可達君民一體、上下一心的理想儒家政治境界。因為這個制度可使在上的了解人民疾苦，施有益於民的政策，任用人民能接受的官吏，這是「廣開刑路」的具體表達。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當西方政治思想進一步輸入時，中國知識份子對於權力問題才有不同看法，認為最理想的政治制

度是「君民平權」。清末鄭觀應和梁啟超主張通過法治及憲法，將中國帶進君主立憲制度，認為這是與儒家「重民」思想相輔相成的理想政治境界；這樣的政治改革，顯然帶有西方民主政治的要求。清末知識份子看見西方國家藉議院式的君主立憲政制而獲得政治及社會的安定繁榮，遂認為西方的富強來自議院制，他們希望中國也能藉西方議院制達到中國聖賢要求的理想政治境界，發揮中國傳統上「重民」的觀念，所以議院制的要求在戊戌維新前後非常強烈。

及後，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中的民權思想大部份建基於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因此相對地不強調傳統的儒家政治理論。五四運動時，中國對民主的要求達到極強烈的地步，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對社會生活也有同樣的要求。

問：民初的民主思想產生了什麼矛盾？

陸：梁啟超、孫中山、陳獨秀等人對民主的理解前後已經有嚴重的分歧；他們固然看到民主之可貴，肯定民主能為國家帶來繁榮富強，但他們亦覺察到當代的中國客觀環境是不能施行民主政治的，原因有三：(一)民主需要廣大民衆的參與，而當時中國民智未開，未懂得參與政治；(二)民主的政治傳統未形成，未有政黨組織及推行民主的工具和條件，例如協助推行民主的傳播工具、教育等；(三)最後是改革份子與群眾之間的疏離。因為有志之士感到改革迫於眉睫，而民衆則不感到改革之需要，以致彼此在思想上產生衝突，而改革人士遂成為「人民的公敵」。

知識份子最嚴重的內部矛盾就是推

行民主的方法問題。他們常問：是否應按步就班的教育群眾，使他們日漸成長而自行改革？抑或施行干預政策，藉獨裁手法帶領民衆去改革？因此，在實行上「革命」和「民主」觀念就產生衝突。「革命」是少數人的工作，目的是為全民獲得民主；而將走在前端的少數人的改革思想施於大多數人身上，這種做法與「民主」意識形成強烈的衝突。知識份子在帶領改革的過程中，常流露出這方面的矛盾。例如：梁啟超在極力鼓吹君主立憲之際，突然覺得中國民智不足而改議「開明專制」；孫中山先生提倡利用三個階段——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及憲法時期，以達到民主政治的境界，其中的做法是首先利用一個革命黨來施行獨裁，然後轉入訓練民衆時期，最後到達立憲的民治時期。外國學者顧魯（GOODNOW）也很贊同這種觀點，表示中國應該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層去改革多年來的積弱和流弊；既然這是強且有效的領導層，所以很難有廣徵民意的民主作風。當時中國青年支持國民黨或共產黨的原因，表示他們願意先有強健的領導，以抵抗外侮，將中國從敗壞、愚昧和貧困中解救出來，然後才談論下一步如何施行民主政體。另一方面，從辛亥革命至軍閥時期間的歷史經驗，處處告訴國人，政治比從前更敗壞，民生比從前更貧困，落後的教育和愚昧的民情一點不因革命而改善。這樣，便逼使本來要倡導民主的知識份子去運用反民主的手段去達到改革目的。本來革命份子以為推翻滿清君權後，中國可以獲得民主政制；但事實上，辛亥革命帶

來了軍閥，將中國進一步的帶入四分五裂之中，政治和經濟情況比往日更壞。基於以上理由，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一四年成立中華革命黨後，漸漸形成「以黨治國」的構思，加上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這個以一黨領導的觀念更為明顯，導致日後胡漢民等主張「黨外無黨」、「黨外無派」之說。

在共產黨方面亦然，在它成立初期也深受這時期的政治形勢所左右。陳獨秀在早期本來希望以文化救國，所以辦「新青年」雜誌，投身於新文化運動，期望開豁國民的思想，但在五四運動後，他轉用「政治干預」的手法。當時名哲學家羅素曾數度訪華，經過觀察表面情況後，認為中國若有一萬名有現代知識、高尚情操和犧牲精神的青年，就可以推動救國。新成立的共產黨很贊同羅素這種主張，他們釐訂方針，立志要做這批救國青年，以少數人藉專制手段去領導改革。一九二〇年代，「強權」和「公理」的問題在「民國日報」引起了一場小辯論，他們探討俄國革命是藉強權抑或公理而成功。一部份人士認為十月革命是公理方面的勝利；但一部份人則認為除公理外，革命份子因擁有強權，所以能操勝券，並認為可以藉強權去護衛公理。於是左傾知識份子就決心仿效俄國，強調組織先鋒黨，與孫中山先生「以黨治國」的主張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可反映二十年代中國的政治理論明顯地趨向「專政主義」。他們再三強調民主為革命的目標，要以非民主的專政與強權手法去爭取民主。但專政與強權一經施展，就難收回。專政手法事實上

相當收效，以國民黨為例，經過軍閥的混亂後，二十年代的國民黨運用強權式的一黨治國政策，國情果然好轉，無論政治和經濟都開始走上軌道。同樣，中共於一九四九年開始以強權的手段治國後，在五〇年代，政治上曾一度有條不紊，與以往四分五裂的情況比較，的確有長足的改進。

國民黨運用獨裁方法以達到民主的目標，有一套很完整的理論，要按步就班有條不紊地由軍訓時期進入訓政時期，然後才到達憲政時期。但在歷史的發展中，三個時期的分野不能這樣齊整和明顯。

問：中共怎樣尋求社會主義的民主呢？

陸：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後，它是從經濟的角度去看民主，認為沒有經濟上的平等，決不能產生政治上的平等，所以他們不追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認為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在經濟上達到社會主義的平均後，階級的疏離會因此而消弭，繼而由大多數的無產階級控制一切，那時就會有比資產階級式民主更民主的情況出現。在尋求社會主義民主的過程中，作為先鋒黨的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去實行專政，在行動上，他們以強硬的手法改革經濟體系，同時在思想上要求一切人接受這套理論。從西方的民主角度看，中國共產黨在追求民主的手法上也是反民主。

問：中國領導人目前面對什麼矛盾？如何作出選擇？

陸：中國領導人目前對國家有兩個艱鉅的責任：一方面要去達成民主；另一方面又要領導國家辦很多的事。若二者不能兼

備，他們就要權衡事態而作出選擇。國家在百廢待興之際，他們會先選擇領導國家去辦事，而不將放寬政策達成民主放在首要位置。

英國史家艾志頓（ACTON）說過：「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當權力集中時，它具有自我的持續性和擴散性，久而久之就會使當權者腐化，從而產生官僚主義，這個現象亦可解釋為什麼官僚主義在國民黨與中共政權中出現。

問：有人說中共在實行四個現代化時，若缺乏第五個現代化——西方式的民主——作動力，它的現代化的步伐會放緩甚至大受影響。你贊成這種說法嗎？

陸：這點我不敢苟同。四個現代化和「民主化」可以是兩件沒有大關係的事，蘇聯沒有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支持，但它在國防、工業及科學上的成就在全球佔一席很重要的位置，祇是在消費品經濟上較資本主義國家落後。若中國不追求西方式的消費經濟的話，它可以不需要西方民主政治的支撐，却可以到達工業、農業、科技及國防等現代化的目標。

問：中國現行的民主集中制，有何特徵？會遇到什麼局限？

陸：中國現行的民主集中制會容許較大程度的民主，但決不願意到達西方國家所謂資本主義方式的民主，因為有幾個關鍵性的問題使他們却步。第一，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強調，要由先鋒黨——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專政。從一九四九年建國之初就依這理論實行人民民主專政；藉政治標準作界定，將群眾分成「人民」及「人民的敵人」兩大部份，在人民中

又再詳細劃分為工、農、小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等，而共產黨代表工農階級去領導全體人民。無論四個現代化使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開放到什麼程度，目前的中國政治仍然以共產黨為主。所以近日鼓吹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也是重申他們的政理論基礎之不變。

第二個關鍵性問題就是思想開放問題。在中共的政治組織上，集權雖是在中央，但我們又見到有政治協商會議之設立，這是思想上作某程度的開放，給予人民表達意見的機會。但一般政治協商會議上的意見尚未能接觸政治上的核心問題，例如真正開放黨禁，准許組織有規模的在野黨派等。

以上政治思想上的局限在傳統中國的社會中也存在着。中國社會尊儒家而罷黜百家，也是由一種意識形態控制整個社會。但過去沒有人反對尊儒，而且，當理論演繹為行動時，馬列思想比儒家的支配力強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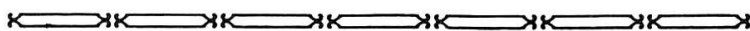
在過去，公社的黨委書記及領導幹部是該單位中至高及可以控制很多事情的人物。今天，人民對此制度深表不滿時，當權者會認為此等人士的思想覺悟程度不足，未能領略無產階級專政的真精神和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孫中山先生也曾將人民的醒覺程度分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三大類。共產黨視人民對馬列主義的覺悟亦然。文革時期，不滿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群便被視為反革命份子，成為無產階級的敵人和被打擊的對象，於是對他們採取「無限上

綱」的方法，以致造成一片凌亂及殘暴。現在中國已從錯誤中學到了教訓，認為一般民衆基本上都是心地善良的，偶然犯錯，也可原諒，可以用教育方法糾正，而且民衆所提的意見大部份亦很合理。但無論如何，中共三十多年來始終堅持馬列主義是唯一正確的政治路綫。

問：從目前中國經濟開放政策，我們可以看到什麼民主遠景？產生什麼問題？

陸：最近中國因現代化而對外開放，尤其是與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頻密接觸，不論黨的領導人願意與否，西方式的自由思想會不斷滲入中國。什麼是社會主義經濟？什麼是社會主義的民主？現行的中

國經濟政策，例如市場經濟、個體經濟、經濟特區等，有可能使中國的經濟變成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嗎？這些問題在這幾年間會有很多的討論。中共的理論家雖然常強調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部份，但過去列寧及文革時期的政治領袖却強調市場經濟及個體經濟會間接滋生資本主義經濟，會導致資產階級法權的重現。試問：現在政府既鼓勵這些現象的復甦，是否與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相符？當所訂定的新政策與黨的路綫有衝突時，是否可以犧牲黨的路綫以滿全辦事效率？這都是中國領導人所要面對的問題。



《中國天主教》第七冊的報導

修院開課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一日，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一市聯合開辦的「佘山修院」，今年又擴大為包括山東、福建、江西在內的六省一市聯合修院。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北京教區天主教神學院開學。

東北三省教區聯合籌辦的瀋陽神哲學院也於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在瀋陽總堂舉行了開學禮。來自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等省的神學生共五十八人。

中南、西南、西北等教區，也正在積極籌辦培養神職人員的修道院。

自八一年以來重開聖堂及
自選主教的數目

自一九八一年以來，中國大陸陸續復修開放了三百多座聖堂。

從一九八一年至八二年底，大陸又有十四個教區自選自聖了主教。他們是：南京教區主教錢惠民、蘇州教區主教馬龍麟、瀋陽教區主教徐振江、天水教區主教趙經農、大荔教區主教張文彬、西安教區主教姬懷讓、江門教區主教李磐石、汕頭教區主教蔡體遠、太原教區主教張信、唐山教區主教劉景和、衡水教區主教范文興、滄州教區主教劉定漢、重慶教區主教劉宗漁、吉林教區主教劉殿墀。

聖經及禮儀書籍的出版

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再版了兩萬餘冊《新經全集》，還印行了《聖經日課》、《拉丁彌撒經書》、《要理問答》、瞻禮單和各種聖像，并製作了祭衣、祭物和宗教用品。